普济往事

陈晓华

恩格斯的故乡巴冕建于1808年，在德国西部、伍珀河右岸，后来与邻近的埃尔伯费尔德等五个城镇组成伍珀塔尔市，也就是今天东莞的友好城市。19世纪中叶，两位巴冕年轻人在伍珀河登上蒸汽船，离开德国莱茵省，进入大西洋，穿越印度洋，前往东方一个叫“中国”的遥远国度。船只停靠在珠江口，这里刚刚经历了激烈战事，当地人销毁了英国商人的鸦片，还勇敢地用炮火去抵抗河面上的英国军舰。两个巴冕人，就在这里创办了一家诊所，救死扶伤。40年后，这家巴冕人创建的诊所发展成为珠三角地区的一家大医院，医院的名字也带着浓浓的中国味，蕴含着“普济众生”的含义，名字叫“普济医院”。



1949年，普济医院护士班的学生与教师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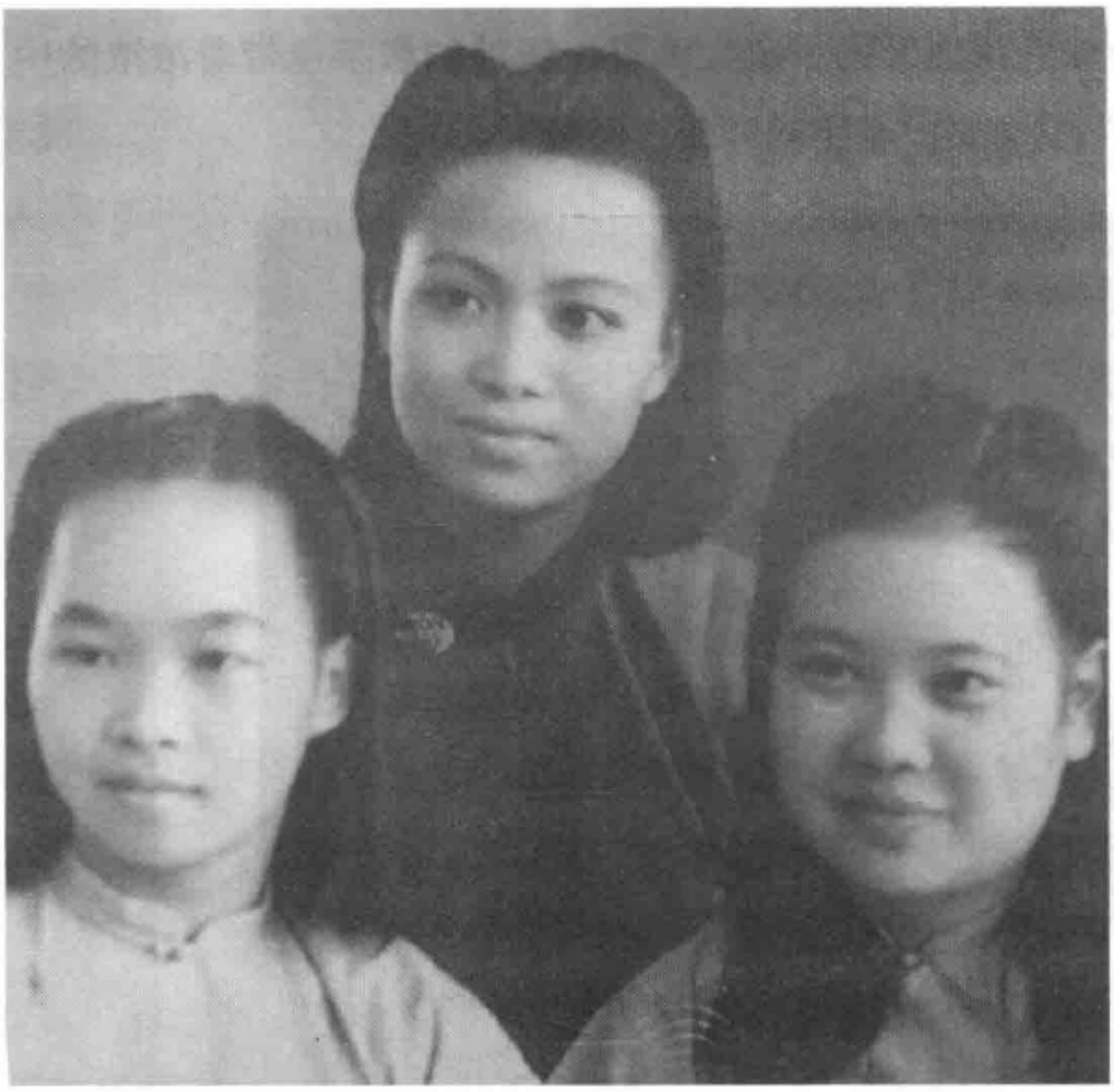
正如1888年的第一任德国院长一样，1921年，东莞普济医院最后一任德国院

长传教医生何惠民（Dr.Otto Hueck）从香港沿珠江、东江抵达东莞。1942年，刘役群从家乡广州增城来到东莞石龙，自此加入礼贤会护士班，展开她“服役社群”的人生。1942年至1949年期间她在东莞学习工作，那7年硝烟弥漫的从医经历如今已成为这位九旬老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初出茅庐　满腔热情

1937年夏，日军南下侵占了广州，封锁中国东南海岸，广州遭到严重毁坏，而东莞则相对平静。1938年东莞沦陷，通往东莞的河道、公路、铁路陷于停顿，同年10月23日，是东莞普济医院成立50周年纪念日，典礼现场门可罗雀，5架飞机从医院的树梢上飞过，何惠民院长称这是“日本人奇怪的问候”。

1942年，增城人刘役群正值二八年华，出落得亭亭玉立，眉清目秀。她随着父亲刘树春来到东莞逃避战乱。父亲早年从金陵学院神学院毕业，对于德国礼贤会的护士班招生广告自然格外留意，虽然役群仅有小学学历，年龄尚且不足，但是父女俩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



年轻时的刘役群（中）

役群对“红楼医院”盛名早有耳闻，可当她真正置身其中时，大楼又是另一番景致，东莞普济医院建在脉沥洲，在水一方，绯红烛照江天。红瓦白墙，钟楼屹立，一派西洋风格。

役群顺利加入礼贤会第三届护士班，完成了三年护理学习，后又接受了两年产科培训。何惠民院长亲授解体学和产科课程，战时课本寥寥无几，役群把课本一字不漏抄下来，并且背得滚瓜烂熟，如饥似渴吸收西医知识。

“成人骨头共有206块，腕骨有手舟骨、月骨、三角骨……手上的骨头可真复杂啊。”役群瞧瞧课本，再瞧瞧自己的手。学习上，役群遇到难题总是反复琢磨到深夜。尽管役群是护士宿舍的舍监，夜间协助巡房，但是她理解和她一样熄灯后偷偷读书的同学。

“Kinder Kinder，点做得。”发现没按时睡觉的学员，巡房的德籍护士长林祺迩（Adele Ranke，东莞人称她为林大姑）操着高亢而风趣的粤语说道。而被批评的护士却笑了。“Kinder Kinder，还笑？”林大姑并不较真。原来被派到香港的礼贤会医护人员都要说粤语，到了东莞有的甚至会说东莞话。

施展仁术　迎接新生

东莞普济医院是中国建立最早的西医院之一，创院伊始，正如医院名称所示，通过赠医赠药给底层人民治病，彰显仁爱博爱，使西医越来越为民众接受。何惠民医术精湛，远近闻名，尤为擅长膀胱手术，医院有一个橱窗，里面摆满大大小小的膀胱结石。当时东莞人普遍对西医外科手术不大有信心，更倾向于找中医治疗内科疾病。普济医院对本土医护人员培养具有积极意义，既减少了本地患者对西医的抵触情绪，又避免了医患之间的沟通障碍。

20世纪40年代，普济医院帮助当地居民免费接生，并传授西方喂养新生儿的方法。役群作为一名西医助产士见证了这些历史时刻。她清楚记得自己接生了33个孩子，不少是难产病例。妇女分娩多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或家人接生，遇到凶险的难产情况，就束手无策了，据东莞市人民医院志记载，旧法接生，产妇患产褥热高达25%，婴儿死亡率高达45%，普济医院提倡的新法接生使这种情况大有改善。役群每救活一个难产婴儿，都感到自豪和欣慰。“屁股出世比脚出世容易。一个脚出世比两个脚出世比较容易，有时候两个脚一起出是很危险的，用人工呼吸或拍腿的方法，多数都能救回来。”这是她在访谈中分享的经验。

坚守仁心　无惧乱世

作为护士，役群日常工作是护理病人，倒痰盂，清理大小便，打包尸体，她常常记挂着病者，忘记了辛苦。

当时美军轰炸日军，误炸平民时有发生，伤员连夜被送往医院，场面相当血腥。看到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躯体，役群不禁潸然泪下。战争和瘟疫是孪生兄弟，当时中国南方是抗战时期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重灾区”，1942—1944年，福建、广东、广西的鼠疫、霍乱异常流行，役群在仲鸾肺痨医舍（该医舍后来改称传染病楼）护理霍乱病人，有些病人一抬进来就死，瘟疫夺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隔离病区弥漫着死亡的凝重气息，护士们像敢死队员奋战在抗疫一线，除了喝一种盐酸杀灭细菌，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战火纷飞，瘟疫肆虐，正是这个二十岁不到的漂亮姑娘，所处的工作环境。

“那年死了这么多人我都没见过（鬼）。我很够胆，我不怕的。”役群说着，脸上带着一贯的平安喜乐。据刘役群回忆，当年全院除一位牧师的太太得霍乱外，其余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心怀仁义　向善而行

1943年12月。广东抗日游击总队在坪山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

1944年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黑衣人穿过普济医院的手术室、药房，原来是离职后加入地下党的孔月嫦护士，“游击队被袭击了，又要劳烦何惠民医生和我走一趟。”她说得急促。过了一会儿，医生的房间灯光亮起，一支医疗队伍跟随着黑衣人急匆匆地离开了普济医院。

役群是这支四人医疗队的成员，他们拿着风灯和手电筒，在东江纵队队员的带领下，穿过漫长的田间小路，到了镇里的一个祠堂。门口放哨的游击队员轻轻打开祠堂的门，医疗队跨进门，就闻到血腥味，听到低声的呻吟。地上铺着的稻草上，满是受伤的东纵战士。何医生用粤语询问了伤员的情况，发现伤情严重，

医疗队立刻开始救治。

如果在传染病房近距离感受到了死亡的凝重，那现在，役群面临的是真切的死亡威胁，死亡是可以触摸的。每次出诊面临的是，一旦被日军和伪军发现，就意味着会有生命危险。她后来回忆道：看见那些伤兵一个个被救过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特别伟大，也值了。

役群深深感到德籍医生何惠民是谦恭善良的人，后来救治了40多位东江纵队的伤员，包括东江纵队司令部参谋主任卢伟良、东一支队三龙大队队长陈昶登。从普济医院，再到后来的东莞市人民医院一直传承着这种人道主义精神。

留下火种　燃亮未来

1926年，德国基督教礼贤会派德籍护士林祺迩任普济医院首任护士长，并扩大了实验室，管理得当的实验室对地处热带地区的医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女孩在实践护理中被认为“从零开始”。

德籍护士悉心指导在院护士关爱病人，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护理人才，而役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于1945年第三届护士班毕业后继续接受了两年的产科培训，于1947年正式毕业。当时大部分女生都想出去发展，纷纷离开了普济医院。役群也打算和同学去增城开诊所，连器材都买好了。林大姑很看重役群，因为她会用显微镜看化验结果，这在当时是一项很高难度的技能。两个人在工作中也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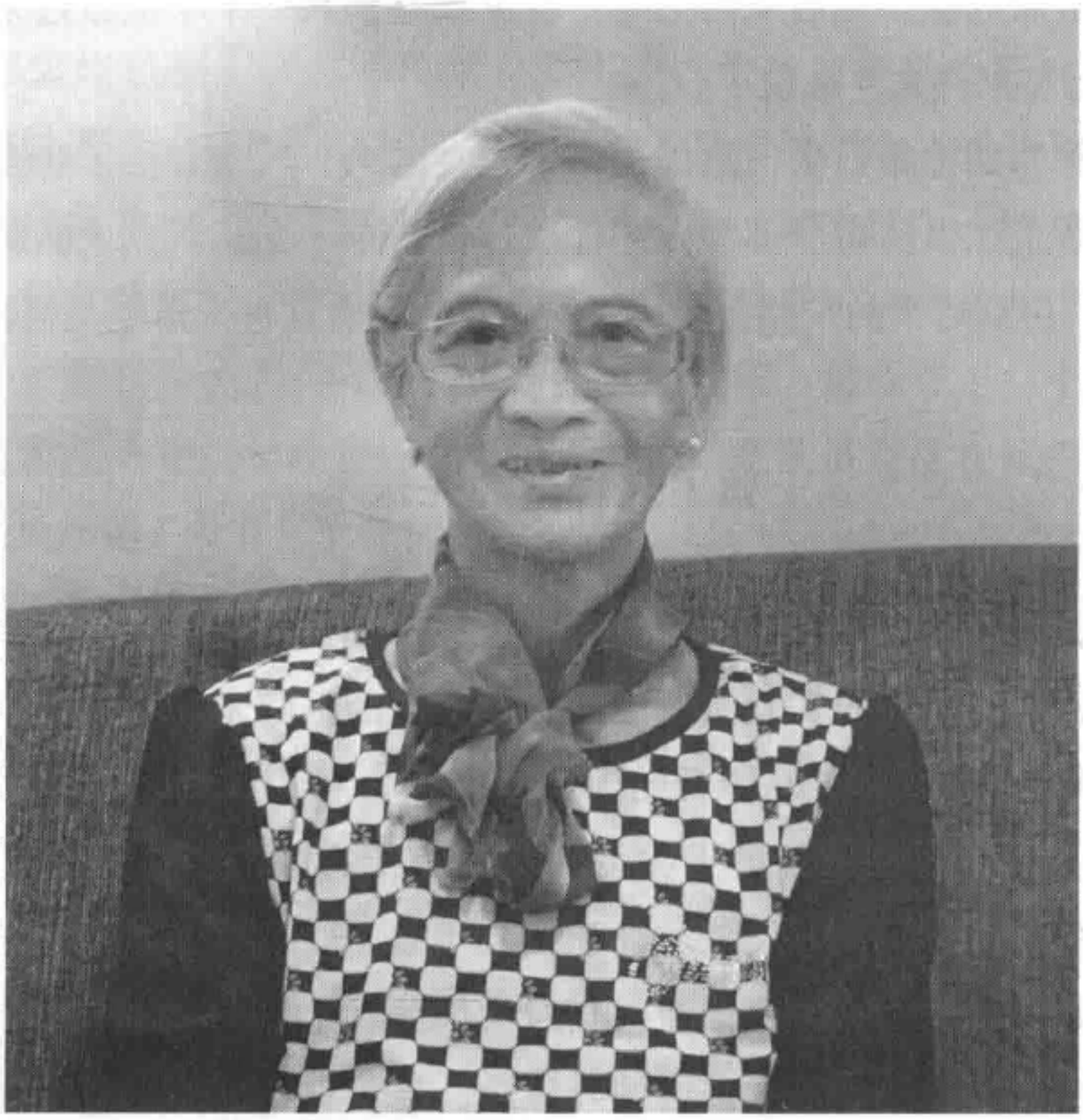
当役群提出要离开时，林大姑对着她痛哭，舍不得她走，希望她留下。所以刘役群含泪答应留下来，又工作了一年多。1949年，役群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林大姑明白无法挽留这位优秀的姑娘了，怀着对役群的深情厚谊，为她准备了一份嫁妆：一套毛线棉被。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便是来之不易的厚礼。

1951年，林大姑返回了德国，依然和役群保持着联系。

1949年，刘役群离开东莞，到东江对岸的香港，在一家保育中心工作，把对护理的这份爱心运用在照顾儿童上，继续“服役群众”。

她仍会想起在普济医院工作的日子，风景宛如昨日。

“医院在城外的河边，到医院必须先穿过北门，然后坐渡船过运河……那里有一所妇女和儿童共用的房子，和一所给男人用的大房子，里面有手术室、药房，和一个小教堂……”



刘役群近照

这是何惠民医生日记里的熟悉的文字，这也是役群记忆中的普济医院。

东江的河水，流过普济医院门前，奔流向前，汇入香江，融入太平洋。19世纪中叶两个伍珀塔尔年轻人，带着医术和友谊，漂洋过海来到了东莞的土地上，种下了仁心仁术的种子。这颗种子，在20世纪发展出了现代的医院，并在21世纪继续服务着东莞人民。

后　记

我们过去知道，1888年，东莞人民医院前身的普济医院由德国礼贤会创建，但未探究这家教会的发源地；2015年，东莞市与德国伍珀塔尔市签署了友好城市协议，但未深入了解过两市的历史渊源。在东莞市档案局展出的“东莞百年图片展”中，笔者发现教会名叫礼贤会（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RMG），起源于德国莱茵省（Rhein音译即粤语“礼贤”）乌柏图的巴冕城（Wuppertal-Barmen），也就是东莞友好城市伍珀塔尔市的前身。伍珀塔尔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故乡，笔者在2020年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通过对有关史料及当事人日记、口述材料研究考证，初步接驳了上述内容的断层，也初步贯通这段历史的脉络。

1847年，第一批年轻的礼贤会传教士柯丽德牧师和叶纳清牧师离开莱茵省，抵达香港，来到虎门镇口开设医馆，就在同一年，恩格斯和这些普济医院的创建者们，同时离开了家乡，各分东西，去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近日笔者用微信采访了现年94岁的役群，原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想到她发来一张又一张照片，还有问必答，蓦地笔者恍然大悟，她无论何时都是时代的弄潮儿，现在玩转社交媒体，过去师夷长技以救人。她发来最后一张图片，是2019年伍珀塔尔市历史图片展宣传海报。图片场景发生在20世纪中叶普济医院实验室，三个中国女孩赫然在目，首位是役群。历史又是那么远，这么近。

刘役群生于1926年，目前定居香港。她是德国礼贤会管理的普济医院目前尚在世的为数不多的医护工作者，是普济医院发展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普济医院1888年在莞城文顺坊创立时，只有门诊部和留医部，病床25张。到了1949年，发展到病床160张。前身为普济医院的东莞市人民医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全院设有三个院区、两个医疗联合体，2019年床位已经达到3020张。门急诊333万人次，住院手术8.6万例次。

“行医济世”的情怀一直不断延续着，从未间断，在伍珀河和东江水，吟唱着“友谊地久天长”。

当东莞人在东江河畔吟诵“逝者如斯夫”时，1836年，16岁的恩格斯在伍珀

河畔，写下一首诗歌：

这支队伍来了，又消失了，
只留下一片闪闪的金光，
啊，怎样才能把他们挽留？
又有谁能把他们赶上？
诗一般的梦幻，
还会重新出现，
当你再次看见他们，
欢乐充满心田。

“一带一路”上的垦荒者

周齐林

多年过去后，张华荣依旧记得那个日子。那是2011年八月的一天，在广东省外经贸厅领导的安排下，他见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总理梅莱斯。

岭南的八月，正是盛夏时节，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热意。当时第26届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正在深圳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的梅莱斯前来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开幕式。梅莱斯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的这次中国之行除了出席开幕式，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他想把中国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带到自己的国家去。埃塞俄比亚劳动力低廉，这对于生产成本和人工成本日益高涨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处于非洲的中心地带。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非盟所在地。埃塞俄比亚自然资源匮乏，没有石油、天然气、煤、黄金、钻石，但人口众多，有9700万人口，人均年GDP（国内生产总值）仅有500多美元，失业率达40%，还有20%的人口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在过去的10多年中，埃塞俄比亚经济一直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是它仍然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将近一亿人口的埃塞俄比亚，80%以上的人口是农业人口，GDP中的四成来自农业。

2011年，埃塞俄比亚制定并开始施行新的五年“经济增长与转型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莱斯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梅莱斯深知这些年埃塞俄比亚的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的帮助与支持。自从2003年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各个领域都能看到中国人的影子。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埃塞俄比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路、通信网络、城市轻轨、第一个风力发电场以及几个重要的水电站等，都由中国